

军人旗帜下的审美更新

□王凤英

异。这样说并不夸张，军事小说中不知何时开始以为民找乐作为文艺的最高境界和价值体现的最佳效果，虽不至于将声色大马作为文艺展示的对象，但对当代军事变革和军人形象的把握显得模糊和虚弱，强调时尚、强调丰厚的物质力量、强调小情小调、强调降低训练标准以保安全等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创作缺失了对社会对充满阳刚之气的艺术作品的审美期待。

永恒普适的精神回归

当人们的视角在生存现实和生命意义之间逡巡而终将作出价值判断和对道德规范进行必然建立时，那种源自内心的尖锐矛盾所抱持的一种精神立场便春暖花开了，这就是集体记忆中伴着天职、使命之类的词汇，有序编码在生命的基因中实现有效升温，这种气质的审美指向了前所未有的层面，使文学在突出军事主体元素的同时，完成了关注国家命运和对奉献精神的美美更新。

军事文学从根本上来讲注重内容表达、情感渲染及精神趋向，那种利率趋向性强的社会关注从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作家永恒普适的写作追求，影响作品叙事的流向和流向的指向性。如对军人形象塑造有追溯有追叙，少有的是深入对下的精神追问，追问和主题有关，追叙只和繁简有关，对过往便会追溯到上辈的上辈的追叙，显得不必要且扯得远远太虚浮。说到底这和作家关注军事文学时的心理状态有关。作家深入基层体验生活的真诚度带着对创作的真诚，视写作是一种使命的需要或生活委实给了自己启示和思考后的升腾，几成神话。为写而写、不得已而写、可写可不写的威胁伤害了军事文学创作的神圣，那种多年思考厚积薄发有灵魂出窍式的写作过程再重建。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油盐酱醋茶，茶味淡了，酱色重了。这些显然还是需要回归到创作的“虚静”，军事作品要达至艺术高度，作家“虚静”的心理状态是必需有且深入达定的境界，浑华与喧嚣的外界状态和身边琐碎诸事的所有联络显然成了这一境界的杀手，佳作“从天籁来”，艺术次品才“从人巧得”。有位作家说，参加应酬一次，至少一周不在状态。状态应是创作时暂时忘掉肉体生命的存在而沉入创作情景之中。己非己，我非我，没有理性，理性已然无用，理性是在修改时的需要，这样的境界几人有或几人能有？如汤显祖写《牡丹亭》、托尔斯泰闭门谢客、萨特谢绝诺贝尔文学奖等等，文学要自然、自由表达而非加之诸多纯理性说教，作家在走上一条“生活是严肃的而艺术是宁静的”（席勒语）真境界的创作之路时，作品便不再刻板承载高尚、智慧、崇高而以更自然然而的方式揭示了军人之美、军队之美、国家民族之大美。当下所谓“无意失聪”现象和“虚静”之神似实在可为作家们借鉴并成为创作常态之注脚。功利写作也罢，跟风式写作也好，均与真正的军事文学写作无关亦和忠诚无关，更与永恒普适的精神回归愈见疏离和幻灭。

当下军事小说创作在军人旗帜下的审美更新紧迫而必要，直面、突破、深入现实注定艰难得多，作家追求更高境界的过程往往意味着别有洞天，但别有洞天何其不易，正因其不易，才谓之可贵。

不必要局限于过去对军事文学的理解，比如军事文学注定要表现战争暴力和战争正义与非正义层面，这些理解一定程度过早地将观念硬性注入创作的天然表达，作家和作品创作之前便承担了过多的责任和理性，军事文学变得不那么引人注目了，不那么耐人寻味了。以至于作家也多，作家也少；作品也多，作品也少。文学退到了看不见的角落，军人的气质更退到了想象力之后的不毛之地。

这样来看，网络军事小说的走红恰恰佐证了读者的精神阅读并不是被欲望化的时代吞没了，不是躲避崇高拒绝神圣，也不调侃庄严消解责任，甘情愿走向猥琐与鄙下，而是呈现出俯仰天地的强大需求。

气象万千的精神硬质

没有谁否认人类最初的心智形态不是诗性的，人类文明在于诗性智慧而非所谓的逻辑想象和科学理性的外指性，文学家眼里的“春光阁”由此隆重揭幕。任何艺术形式，只有与主体的心灵情感结合形成“力的样式”的同构关系时才谈得上审美感染力。如何创作军事文学，如何表现军营生活，如何塑造军人形象，在生命与尊严、军人气质与部队实际之间不再作出平衡时，军事文学里便具有了一种与视死如归同样卓越的精神硬质。中学课本里删除了《狼牙山五壮士》，勇于献身的高尚似乎黯然谢幕，《蜗牛》这样的歌曲却登堂入室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旋律，各种怪异并非个例。是否可以忽略祖国利益、民族利益、集体利益？作品表现如狼牙山五壮士，又如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等舍生取义的高尚，恰是获得审美感染力的精神硬质气象万千的打开方式。

军人的行为方式、军人的气质一如既往地有当下社会关注的热情，不少军事小说表现的视角就是以诗性的心智站在超出军事的高度，认识整个军事文学乃至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先进文化。为数不少的作家不努力力地使二者结合得自然流畅。远如昔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在描写俄罗斯人民生活的一个历史阶段的顿河史诗中所表现的艺术力量和正直。又如索尔仁尼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对不可摧毁的“人的尊严”的肯定和对破坏这一尊严的一切企图的批判。近如温亚军《驮水的日子》、袁山山《我在天堂等你》、朱苏进《炮群》、马晓刚《杀猪的女兵》、黄国荣《碑》等，以军事战斗之外的另一种战斗力张扬军人有别于其他群体的行为方式。这样的张扬其实正是张扬了军队天然的正面目，将属于军人的硬质重新回归到军队，回归到社会对军人由仰慕而生发的敬重。其作品审美地反映军人的精神世界，艺术地引领军人的行为方式，将作为社会文化先进文化、和谐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当代军事文艺在阳刚的军人气魄、威武振奋的军魂以及崇高的奉献、牺牲精神和昂扬不屈的民族精神等方面做出了绝佳的诠释。

如《蜗牛》被评为教育歌曲一样，角色模糊化的军人形象和所谓的军人行为方式在为数不多但决非极个别的精神小说中，若将活动场景和着装等独属于军队的符号予以置换，其人物形象、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模式等便与普通老百姓无异，与地方题材无

军事文艺

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在历史或者自我存在中，较高层次的生命状态是人类不可也不会拒绝的意志选择，其中，民族利益、集体利益和历史进步这种似乎已化成血脉的经络仍然是当下军人颇具优势的气质。

俯仰天地的精神阅读

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一部作品的问世意味着铺天盖地的心潮澎湃和风行大江南北，作家和他的作品一时间成为天空最红的云团这样的品评毫不为过，如《西线无战事》《高山下的花环》等，使当下的军事小说和作家们望尘莫及。是不是可以慨叹当下读者的艺术鉴赏力得到了远离文学的视线，甚至远离了审美的轨道？而当下反映军人风貌和部队现实成为一块创作短板的批评不绝于耳，是不是也能说明军事小说和作家们的创造力、文学想象力、艺术水平一落千丈？主流的军事文学似乎不如八九十年代了，可能衰落了，有人会怪罪现代社会人心浮躁，精神在一夜间走失或者流浪得毫无踪影，仿佛最淳朴最柔软的心灵之约在云重气浊里变得面目可憎以至于无可挽救。

然而，就当下文坛而言，长篇小说年产量4000余部，在网络上写作的作者约2000万，如此庞大得超出想象的数字令人难以置信，可却真实地存在且有相当长的时间。不管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仅此一串数字足以看出有更为惊人的阅读群体支持才使作家和作品具有了写作和出版的热情，而读者的阅读热情并不比以往任何时候弱，那些动辄抱怨阅读大众传媒呈现歌舞升平浮世繁华、忙于万民选秀一夜成名，追求写作实在是愚不可及苦不堪言，追求时尚尚不是二法门的奇谈怪论，终将止步于此，噤声于此。凭心而论，木子美写作、各种宝贝写作之诸种惊世骇俗的“壮举”写作风行文化市场，手忙脚乱地轰炸所有读者的审美趣味呈现了前所未有的低价和怪异。严格地说，不能生成意象便都不是艺术，或可称之为物质碎片，有情有味的生活场景“被斑斓”，彻底把生活物化决非这个社会人们精神所需的全部。

所以说，电影本身是反诗化的艺术，文学则是诗化的艺术，当艺术沉陷在无边的消费文化之内而无可奈何地叹息时，以前军事小说一往情深地对生活的记忆，给后人留下了反复提及的空间和追望。毕竟高尚和提气的元素有着由来已久的正面张力。早些年时候红透半边天的军事作品未必好得可以堪称经典并能与其影响力成正比，而当下的军事作品未必就在思想艺术和小说技法甚至生命体验上近于“虚脱”、迟钝，恰恰相反，当下的军事文学景象并不寂寥，虽然热闹的身影已跨越文本冲垮文学本身，以汹涌之势淹没在各种非意象的艺术之中，但为数更多的读者的精神需求恰在关注国家命运和正义力量的彰显。如网络军事文学之所以呈现一种令人费解的兴旺，便是网络写手们挣脱对当下军营生活的现实捆扎而在思维程式上走入天马行空。如《红蓝对抗》《远征》《铁血大兵》《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等网络军事小说，他们不管是颇有在现实想象之外的信马由缰行走，还是军人形象出离了一定的历史限定性而产生“并非那回事”的模糊，书中的军人生活有远离了部队实际框架之嫌。即使这样，他们仍然异常受欢迎，甚至评价之高令主流军事文学张口结舌。也许会以为作者并非军人，并非军人的便利使之规避了所有的现实约束。

不管怎样，这样的场面值得深思。军事文学的观念达到了亟需更新的时候，作家不应该也

问题在于还是要回到我们自身。我们过去从曾经的战争生活和当代的军事生活发现和开掘的文学主题，总给人以狭窄与单一之感，显得不那么新颖、壮阔和深邃，逼仄的格局自然影响作品充沛的气韵，也使我们对于军事题材的文学表现难以呈现博大而丰富的万千气象与无穷景观。事实上我们民族所经历的战争生活多样、惨烈、复杂而绵长，其中所包孕的深邃与厚重，疼痛与爱怜，悲愤与欣悦，血腥与诗意，事实与哲理，蕴藏着无限可供我们的作家以战争文学的形式来审视民族生活和内心情感的秘密。这些常常是流血漂橹的战争生活令人每每回想起来，备觉有刺穿神经直达心灵底层的尖锐力量。而且中国战争生活内容本身具有的更多向度和多维性，能够够大地容许作家在其中无限伸展与腾挪自己的手脚。我们有时恰恰甘于在某种小格局中进行着缩手缩脚的经营，让人看不到那种突破藩篱的创造精神的飞扬。一旦某种局限创作的观念与思想的窒碍被打开，作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得到尽情的释放，军事题材创作新的审美境界和文学天地就会豁然出现。

我们还必须看到的问题是，今天我们所置身的是一个新的世界，这也意味着文学走到了一个新的起点。我国的军事题材作家以怎样的姿态来面对这个新的世界，对此已经做好了怎样的心理和创作准备，又从怎样的一种视角与视野，来继续思考和深化对战争题材和军事生活的表现，都是很值得研究的。无论愿意与否，中国作家都不应再仅仅是为国内的读者写作，而必须有一种面向世界的雄心与勇气。作为一个大国的文学，应当拒绝小格局的、小家子气的东西，需要在体现中国文化、心理与性格等鲜明特征的同时，还要体现出一种审视、包容和关怀世界的襟抱，达于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高度，从作品中散发和传达出一种属于战争文学特有的、对于战争与和平、社会与历史、人性与人情等相关命题的重要发现。能让入从中读出作为一个大国的文学的创造与胆魄、境界与见识、精神与情感，让读者透过具有新的经典意味的战争和军事题材作品，进一步认识和看清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构造，认识和看清处在更高层次上的人类自己。

因此是否在一种时代的高度上，自觉而适时地完成作家自身的蜕变，成为一个很重要、很迫切的问题，这决定了我们在新的形势下，能不能实现我们所一直梦想的中国军事文学的真正腾飞。其中最起决定作用的要素自然还是作家本身。我国军事题材作家的水平与能力问题时常被人论及与质疑，并被指出诸多短处与不足，言说者无论是疾言厉色，还是语调平和，透出的都是某种神情与心情的急切。就创作的实际而言，一般性的写作可谓参与者众多，而我們所需要的能代表国家水准的顶尖作品，需要有极具天赋与才气的作家，需要有特立挺拔、口吐虹霓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家或大师。但由于历史或现实的原因，我们的不少作家包括一线的活跃作家，大都存在着某种先天不足的缺陷，即生活的积累、文学的修养和哲学的准备均嫌欠缺，有的作家即使心雄万夫，没有充足的支持体量，不曾积攒起充沛的自身能量，是难以凭个体大而杰出的创造过程的。这些方面对于我国的军事题材创作来说，都将是长期而艰巨的挑战。

为了中国军事题材创作更加辉煌的未来，我们必须不断地充实与改变自己，使更多人成为真正能够扛大活、出大作，并且能够昂首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

寻找和展示新的姿态

□汪守德

近些年军事题材文学仍不断有佳作问世，在全国出版和发表的众多文学作品中，始终以自己的独特风貌和品格占有一席之地，并也常能引起人们的热议与好评。我们或许可以指出《拆弹》《碑》《我是我的神》《突围》《流芳记》《预警》《往生》《回鹿山》《同胞》等许多作品，这些作品无疑可以部分地代表当前军事题材创作的实绩与水准。

从上述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颇为值得关注的现象，即无论是军队作家还是地方作家，大多不再像过去那样一窝蜂地往某类题材聚集，也不再按某种共同的审美追求进行着集团式的冲锋或跟进。而似乎更注重从所占有的题材空间和各自的生活体验出发，从事着某种更具独立品格与倾向的写作。因此使整个军事题材创作看起来呈现出某种不成阵式、却又是多样分布的散兵队形，作家的写作也似乎更加自由和不受约束，其创作的企图和才能也能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和展示。

这其实是文学理应具有的一种常态，但却让军事题材创作的观察者与研究者难以再按往日的逻辑与方法进行梳理，对其做出更为清晰的分类与概括变得不容易。不管目前的这种创作状况表现得如何纷纭，且让人假如以我们通常所习惯的指标来衡量，可能感觉不到军事题材创作在现阶段所取得的明显而实质性的进展，然而必须给予肯定的是，从创作的总体而言，在题材的拓展、意蕴的深化与审美的提升，又都是在悄然之中扎实地进行着的，使军事题材文学整体面貌和内涵，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改观与丰赡。这一点常常是为众多读者和论者所提及和认同的。

不过，对军事题材创作的现状进行客观而冷静 的分析，我以似乎存在着某种易于忽视的问题，殊为令人警觉和深思。即现阶段军事题材创作在文学主题和艺术指向上，仿佛越来越缺少十分明确的目标。许多作家都在进行着某种自在自为的写作，但都常常囿于创作选题与审美的自足。其出版与发表的作品虽不能说不具有较好的质量，所表现的生活也不能说不真实和丰富，然而从创作者的实际现状来分析，对当前的军事题材创作究竟应该有怎样的文学旨归，应该进行怎样的审美建构和哲理思考，应该怎样推进军事题材创作美学的整体嬗变，似乎都不甚了了，有如困惑与恍惚于云里雾里，有些看不清方向。

这同相当一个时期来的情形是颇为不同的。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作家对国外军事题材作品的刻意模仿与借鉴，加之自身创造力的空前激发，从而形成了推动创作发展的双合力，使得军事题材的创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可喜局面，其主要标志是，在几乎所有方面都进行了花样翻新 的尝试，并且确也呈现出众多品类不凡、颇可观赏的佳作。《西线无战事》《高山下的花环》《雷场上的相思树》《最后的堡垒》等，都是其中广为传颂、脍炙人口的名篇。这些年来来的军事题材作品似乎日渐稀少，起碼军有特别打眼的事件题材而国内作者青黄。缺乏外部同类题材作品的有效参照，又兼有些作家移情于影视，乐此不疲地从事着另一样式的艺术生产；或沉湎于收藏之类的雅兴，其精神状态持续低廉难以提振，从而使当下军事题材创作的整个态势，陷入某种不应有的纷纭、迷茫、犹疑与困顿之中。

因此这意味着需要寻找和展示新的姿态，踏出一条更为新奇的创作路径，突破我国军事题材文学面临的困局，乘势出落成一番国色天香般迷人风致。这显然是值得期待的。

散文与人

周涛让我想起刀郎。或许这是一个不太恰当的类比，但我想，已近古稀的周涛与这位流行的通俗歌者之间，或许还是有着某种内在联系的，诸如他们都是生活在天山脚下着的汉人，在异地的文化环境中不断被两种文化所熏染，也互相激荡甚至 是排斥和冲突。这是一种孤独的创作心境，但周涛毕竟是周涛，老者的周涛，经历过诸多暗淡岁月的淘洗和磨砺，这是歌者刀郎可能无法体味的。因此，我读周涛，读到他忧郁中的悲愤与沧桑，这是我之前所没有想到，甚至也难以体会的。很多人在赞颂周涛散文的优美、刚健和雄浑，其实并未读懂周涛，没有感受到他内心深处的孤独、忧伤与深沉。薄薄的一册《周涛卷》，收录散文36篇，其中《巩乃斯河的马》《猛禽》《忧郁的巩乃斯河》《伊犁秋天的札记》等名篇，难道不都是写给他自己的心灵独白吗？军人周涛，汉人周涛，诗人周涛，客居者周涛，散文家周涛，都不能概括他的全部，而他的复杂与奥秘正在于此。读周涛，要在字里行间体味。

我与作家李存葆曾有过一面之缘。颇具戏剧性的是，我见到李存葆的那次是在军艺校园的某个午后，作家手拿一小捆大葱默然疾行，熟悉他的一位学友上前问候，我才知道这位穿着极为朴素、形似农人的老者，乃是曾经写过举国震动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的作家李存葆，这般形象与我从李存葆的小说中得出的形象基本吻合。但且慢，我随后读到他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散文集《大河遗梦》，却是篇幅甚长的文化大散文，乃又是一种儒雅形象。这种写作，与我从李存葆的想象便有些隔阂，因为我总是以为只有那些学识渊博、形象儒雅的文化人才会选择这种风雅写作。待我细细读完李存葆的散文长篇，我以为李存葆还是农人，却还是齐鲁儒家文化熏染的军人，也是一位官至将军但不改农人本色的文人，也因此，读了他的文字，可见其中的质朴、忧患与大气，而绝非许多文化散文写作者的雕琢、刻意与无病呻吟。

从未见过徐光耀，直到后来读了他的《昨夜西风凋碧树》才知道，这样幽默、风趣、乡土气息颇为浓厚的作品，却是在山雨欲来的暴风雨前夜写就的。徐光耀曾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重大事件，后来在政治运动中备受折磨，他的人生本就是一笔珍贵的历史财富，而其中的长篇散文《昨夜西风凋碧树》，便是记录这些历史旧事的一部大作。此书甚薄，但我却越读越厚，其中的质朴、沉静与清澈，让我看到了一

个人内心的博大、乐观与坚韧，那种对于历史叙述的执著、克制、追寻与反思，我以为达到了近年来历史散文写作的极高水准，却也是一部未被广泛关注的佳作。作为处于历史迷团中的当事人，叙述者保持了一种寻找谜底的记录者态度，常常让人读来身临其境，唏嘘不已。我由此读到了一个清醒者反思的深度，也看到了一个度尽劫难者尊严的光辉，这些均让我尊重。

还是老者，王宗仁。他的散文《藏地兵书》书写自己对于青藏高原的往事，深沉、博大、高远，仿佛置身那遥远、神秘又极为艰苦的土地。我知 道作为西北高原的陕西人，骨子里多是有着一种沉默的倔强与执拗，正如王宗仁对于西藏的情怀一样，他几乎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这片土地的写作。书写西藏的山川万物，书写在西藏那片土地上的人间生灵，也书写他经历的高原往事。诗人艾青写到，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王宗仁正是如此，我读他笔下的文字，不华美，不雕琢，但他胜在感情饱满，胜在一片冰心在玉壶式的真诚，也胜在大气磅礴满腔无私的精神情怀。

那么，另外一部关于西藏的散文集《遥远的天堂》，与王宗仁的质朴与热烈恰恰相反，作家袁山山表达达对于西藏这片神秘土地以及那里的军人官兵的爱，却是充满着一种来自女性的温柔与慈爱。我读《遥远的天堂》，可以读到一个女性，一个母亲，一个作家，一个军人，一个外来者，一个现代化城市人，正是这如此之多重的身份，让她与这片土地以及这片土地上的人与事、时而显得亲近，时而充满张力，诸如女性的温柔、母性的慈爱，作家的灵敏，军人的坚韧，外来者的文明，城市人的现代，等等，这些元素交织在一起，如同交响乐中的音符一样，此起彼伏，也使得她的这部散文集显得如此地轻盈而开阔。学者钱穆在《中国学术史》中讲到，好的文章是每一个文章后面都站着一个人。我读这5部散文佳作，正是这样的感受。

文以载道

周涛在散文中多次提及记忆。诸如在《伊犁秋天的札记》中，他写到：“那些令我不快的记忆我现在不想说它，因为它已够那些编故事者而苦于生活经历贫乏的人写一部部长篇小说。”但其实，周涛在散文中更多写的是骏马，是河流，是山川，是雄鹰，甚至是拖拉机的犁铧，他在非常细致地描述它们，但细细体味，却发现周涛是在写他自

文章事 寸心知

——近年来鲁迅文学奖获奖军旅散文札记

□宋航满

己的心绪，写他的沉思。毕竟是诗人，但我觉得周涛更像是一位艺术家。他说自己喜欢绘画，可以借助笔下的风景与物品，来表达自己的思考，就像古人的水墨绘画，其间都隐藏着太多的精神表达。周涛的这些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散文，实际上还是带着许多伤痕与反思文学印记的，但他的文学技巧实在于太高，你很难体味到他在这些散文片段中对于那段噩梦般的历史的沉重体味，以及对于人的心灵的伤害透露出的疼痛与恐怖。

那么，徐光耀几乎都是在直接描述记忆。古词云，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读徐光耀的《昨夜西风凋碧树》，恰如古诗词所描述的 那种登楼望秋色的情景，心境竟由此而开阔，胸怀也因此而博大。这首散文作品写到历史风暴中的人性丑恶，令人颇感惊心动魄，文人与文人之间的争斗，一点也不亚于战争的残酷。我惊叹于徐光耀对于这段记忆的冷静与克制，但我想正是因此，历史的反思与记录才更有价值，也才更有艺术的魅力。而我读这册回忆散文集之后，既看到了人性的复杂与丑恶，也看到了很多平凡的人间温暖，诸如他写到濡濡以沫的爱情，写到情同手足的邻人，写到战乱中共患难的友人，都是在极为冰冷 的环境中给这个世界抹上了温暖的色彩。在这本书中，散文《千萌大队》《两出大戏》等描述历史灾难往事的文章，令人读后难以释怀；而《跳崖壮士》《紧罗》等描述故人与亲人的文章，读来则让人心热。对于人性的体察，在徐光耀作品里达到极深的地步，因为他是用生命体悟的。

我从李存葆的《大河遗梦》中读到儒者的仁心。初读这些文化散文，我想到了他早年的小说作品，其中散发着一个底层人的博大胸怀。但我以为，那不过是一个 人对于民族的一种淳朴情感激烈碰撞的自发结果，而在《大河遗梦》这些散文篇章中，李存葆也同样表达了自己作为中华民族后代 的忧患心绪，这种书写或多或少有着作家心灵倾诉的心理，但更重要的是他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文人的自觉反思，对于现代文明所带来的种种危机的忧虑与批判，以及由此表达出

自己的希冀。诸如《鲸殇》中对于大肆捕杀鲸鱼的描述，再如《沂蒙匪事》中对于历史匪事猖獗的追寻，等等，都是在试图恢复一种作家理想中的和谐秩序，诸如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等多重关系中的和谐。最典型的莫过于散文《飘逝的绝唱》中，李存葆对于王实甫在《西厢记》中

关于美的不同态度，而表达了他对古典生活秩序的赞赏，由此来批判现代社会价值体系的沦丧与危机。王宗仁的《藏地兵书》与袁山山的《遥远的天堂》都是对于藏地军人的礼赞。不同的是，王宗仁是以自己的经历来描述，而袁山山则是以一个外来者去观察，两者各有区分，但指向却是一致的。但也因此，王宗仁的《藏地兵书》就要更为厚重一些，他对于藏地军人的描述，多了一些来自历史的审视、对比与思考，诸如《太阳有泪》，写一位被历史灾难所迫害的军人的生命运，而《嫂娘》则带给人一种十分别致的生活场景，也就是女性在藏地军人中的存在与价值，都是读后令人心灵升华的篇章。袁山山的《遥远的天堂》记录了她的西藏之旅，许许多多她所见到、听到、想到甚至是触摸到的情景，因为是近距离的观察与体验，被作家写得十分的细腻和饱满，从而让人看到了与论者不同生存环境中的高远和伟岸。王宗仁和袁山山的这两部散文都是典型的主旋律作品，因为论者写得真诚，描述得真实，体验得真切，让人读后心生亲近之感。

杂花生树

李存葆在作完《沂蒙匪事》之后，曾作有文章《〈沂蒙匪事〉赘语》，起因是《中篇小说选刊》决定选这篇散文。从写作的角度来看，他曾经更重要的身份是小说家，更为关键的是，这些散文写作在叙述中都采用了小说的笔法，这里所谓的笔法并非虚构，而是指故事性，特别是故事的连贯性、可读性与丰富性。对于李存葆来说，这种无意的结果，却带来了良好的效果。虽说文无定法，但散文多强调“形散神不散”，因此以小说笔法写成散文，自然多有一些新颖之处了。李存葆的文化大散文还有一个特点，便是在文体上极为讲究气势的营造，往往在词语、句势、段落上采取同义词语、句子甚至是段落的重复、排比，形成了较为强烈的冲击力。

周涛的散文诗意、凝练、跳跃性强，几乎没有叙事的情节，表达更多的是一种思想与心理的思考和情绪。显然，周涛是在用诗歌的笔法来书写

散文，甚至很多篇章都可以看做是十分杰出的散文诗。将诗歌的笔法带入到散文写作之中，周涛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形成了他独具一格的写作范例。也因此，周涛的散文多简约，多诗性，多哲思，许多片段令人想到奥克斯文的《沉思录》、余光耀的《昨夜西风凋碧树》则如纪录片，风格冷静，画面干净，情节与逻辑推动也是十分清晰的，甚至能够常常将人带入历史的现场；而这册著作本身就是属于回忆录的性质，也可以说作家是用散文的笔法来书写自传。由于传记作品要求书写者必须尊重历史的事实，尽量降低文学的渲染，所以在处理两者关系上，作家可谓 是达到十分美好的平衡，成为这一写作的范例。

王宗仁的《藏地兵书》则带有报告文学的意味，而袁山山的《遥远的天堂》则带着新闻通讯的色彩。两者均受新闻与报告的影响，这使得作品在写作时显得鲜活，常常可以捕捉到很多现场的细节之处，读来让人感到十分的温馨动人。在王宗仁和袁山山的笔下，西藏这片神秘的地方不再神秘，而是充满了一种人性的崇高与悲壮，让人颇有荡气回肠之感。但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他们笔下的 人与事和西藏这块土地缺乏内在的联系，因为除了自然环境的恶劣与艰辛之外，同样生活在这里的藏地民众的感受，以及他们在文化、民族、传统、风俗等方面的因素，也需作家予以重视。

5部散文作品，5种独特的品格与气质。周涛高蹈，李存葆大气，徐光耀沉静，王宗仁热烈，袁山山温柔，但高蹈者却忧郁，大气者却忧愤，沉静者却悲愤，热烈者却感伤，温柔者却怜悯。诗人周涛，怀抱哲人的孤独；作家李存葆，书写了儒者的襟怀；小说家徐光耀，带着审视人性的眼光；散文家王宗仁，还是一颗淳朴的童心；作家袁山山，温柔与细腻中满是女性的博爱。他们本都无意成为散文家，只因为散文是抒怀，是倾诉，是表达，是精神的散步，是人生的遥望，是思想的抒情。而无论是哪一种的风格，哪一种的情怀，哪一种的思想，我都可以从他们的文字中读到一个军人的气魄、心理、思考，甚至是局限。也因此，周涛的散文，引而不发，含而不露，不战而屈人之兵；李存葆的散文，如兵操练，威武庄严，却多有重复；徐光耀的散文，如布兵作战，可谓举重若轻，深思多谋；王宗仁的散文，如士兵冲锋，刀光剑影，让人热血沸腾；袁山山的散文，如女兵列阵，英姿飒爽，却还有一分娇媚与风流。我读他们的散文，精神仿佛因此而明亮，思想似乎因此而深沉，气质也好像因此而敏锐，如此甚好。